

# 新加坡族群关系演变 (1819—1965年)

李京桦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 在1819-1965这一段时期, 新加坡历史上经历了殖民、联邦两个阶段, 不同阶段的统治阶级对待族群关系的态度也不同, 经历了种族隔离、种族冲突两种形态。大的演变之中, 也存在着小的波折和复杂性, 比如殖民时期的日本殖民时期就和英殖民时期不一样, 而且建国伊始新加坡领导人还有一段很强烈的危机意识萌发状态。新加坡从开埠时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造成不同种族以及种族内部的隔离, 到马来联邦时期由于民族主义的煽动, 引起了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 马华冲突直接导致新加坡独立。独立之后的新加坡, 感觉到了周边国际关系和在新加坡生存发展的双重压力, 由此萌生了使新加坡受益匪浅的危机意识。

**关键词:** 新加坡; 族群关系; 种族隔离; 危机意识

中图分类号: D73.339.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16) 12-0023-07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6.12.006

##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Ethnic Relations (1819-1965)

LI Jing-hua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Singapore has witnessed two stages—a colonial period and then a federal period—throughout its history. The ruling class from two different periods presented two different attitudes over the ethnic relations, which ended up with two basic forms of such relations: apartheid and ethnic conflicts. Despite two major relation forms, there were still tortuosity and complexity existing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For instance, the evolution form of ethnic relations in Singapore colonized by Japan differs from that in Singapore ruled by Britain. Furthermore, dat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its leaders had remained nascent but strong crisis awarenes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various ethnics and the inside division of every ethnic came into being when Singapore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during its opening-up period. Moreover,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layan and Chinese, instigated by the nation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Federated Malay States, directly stimulated the 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 The leaders of Singapore had sensed a dual pressure from the peripheral circumstances and its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hich led to the birth of its profitable crisis awareness.

**Key words:** Singapore, ethnic relations, ethnic segregation, crisis awareness.

新加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民族关系所呈现的状态不同。不同时期的族群关系的定位和状况都是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果, 是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观的反映。从1819年开

埠, 到1965年独立, 新加坡族群关系经历了种族隔离和种族冲突两种形态。但是,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前后, 由于内忧外患萌生了使新加坡受益匪浅的危机意识, 这种危机意识促使新加坡领导

收稿日期: 2016-10-12

[作者] 李京桦 (1977-), 女, 河南新乡人, 博士,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 民族政治学。

和政府一直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并能反思和前瞻性地做出决策。所以,历史从来就不曾离开,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研究新加坡独立之前的族群关系演变,可以揭示殖民时期政策对民族环境和族群关系有着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即政策是如何把族群关系引向隔离和冲突的,并为政府的方针引导和调控族群关系提供有力的例证。

### 一、英殖民时期的种族隔离的原因和状况

#### (一) 英殖民时期种族隔离的原因

第一,政府力量不足。英殖民时期派到新加坡的管理行政人员稀少,办公经费短缺。在这种条件下,无力管理短时间内新加坡快速增加的移民。为了方便和有效地管理来新加坡谋生的移民,并使得不同种族的人相安无事。殖民政府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族群之间相互隔离,没有交往就不会有冲突。此外,教育的隔离,是产生隔离的重要原因。新加坡殖民政府本身资金短缺,不可能发展教育,来新加坡的各种族移民语言不通,加上教育隔离和落后,这都是形成种族隔离客观事实。当时的教育状况是很多华人甚至让自己的孩子回中国读书,而马来人上马来人学校,印尼人上印尼人学校,也有英国政府主办的英语学校,发展了四大主流学校教育。这些学校又大多用单一语言进行教学,这样的单语制,强化了语言的隔离,没有共同语言各族之间更没有机会沟通。在英殖民时期,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政府的立法、行政、公告都是以英文为本,但并未压制其他族群语言的使用,各族群语言的报纸也可以发行,以各族群语言为主流的学校也都各自存在,由此,各种族之间也相安无事。

第二,英殖民时期对新加坡的定位及影响。新加坡的现实状况取决于英殖民者对新加坡的定位,殖民者对新加坡的经济定位决定了英殖民对新加坡内部所采取的管理措施和统治理念。莱佛士向新加坡商人保证:“任何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利的考虑都不能动摇这些广泛的自由主义原则……新加坡将长期、永久是个自由港,不会冒险阻碍自身未来兴旺发展的危险对贸易或工业征税。”<sup>[1] (P33)</sup>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作为东部群岛交易的中转点,距离到中国的贸易路线也很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成了莱佛士对新加坡的最初定位是,贸易自由、自由经商,免收贸易和工业税等。新加坡逐渐发展成为英国的在东南海

域的一块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殖民地。这在当时与其他国家统治的港口完全不同,在这些港口殖民统治者征收重税,法令朝令夕改,有着诸多限制的大环境。与这些港口相比,英国人对经济的自由态度和放任不管,对移民来说就是天堂。

鉴于自由港的定位英国人在当时的治理理念相对宽松适中,这种统治方式对新加坡现在的政治体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就是英国政府疏于对新加坡的管理和投入。英国人对新加坡的定位对新加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影响了新加坡殖民时期的族群关系。新加坡对于英国来说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但是作为一个荒凉的小岛,如果想尽快复兴,就必须有着能够吸引人的开明的政策。英国统治新加坡初期,为了使各族裔能自行管理族内事物,曾执行了一段时间的甲必丹制度,就是各民族首领直接监督,由头人向驻扎官负责的制度。1826年,新加坡与马六甲合并为海峡殖民地时,甲必丹制度1826年11月废除,新加坡开始有了自己的司法制度。新加坡从开埠到独立,经历了数任总督,大多数都能以新加坡的经济和发展为第一要务,即使在经费紧张时期,也能坚持最初的对过往船只不收关税的政策。

#### (二) 英殖民时期族群关系隔离的真实状况

殖民统治者时期,殖民者对新加坡族群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新加坡,英国人比较倚重马来人,在殖民初期是为了赢得苏丹贵族的支持,到后来是为了压制华人的发展。华人在新加坡人口占到绝大多数,并且一部分华人在新加坡取得了商业的成功。英国人非常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华人,各方面势力在新加坡的增长,所以,新加坡的警察和公务员只能由马来人担任。

##### 1. 英殖民时期族群的分层

莱佛士尽管在新加坡待的时间不长,但从一开始就对新加坡作了规划:各个社区分开聚居,分别由各自的头人管理。<sup>[1] (P20)</sup> 在开埠初期,莱佛士鼓励人民移殖,积极开发土地。他更充分了解人口和城市的微妙关系,他划分各族居民的区域,在小岛的东端武吉斯的村落,他们需要在梧槽河口起落货物,在今日的大回教堂富锦的“甘榜格南”是马来人、阿拉伯人和印度籍回教徒的聚居地方;这个区域以南,是欧洲人的市场。而新加坡河的南岸是欧、亚大商行的办事处和货

仓。至于商业中心是在沼泽地所填平的一片土地上，那就是今日的莱佛士坊。而在新加坡河南的岸边一直到牛车水则是华人垦殖的地方，两个月之间，华人在该地建成村落；一年之后，更发展成为市区。

新加坡移民的天堂。新加坡的移民是幸福的，因为新加坡享受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政局稳定，新加坡的经济除了在周期性的全球经济中略受影响外，一直繁荣昌盛。相对于当时中国的外侵、内乱以及欧洲国家长达数年的战争，新加坡真的就是移民的天堂，很多移民带着发财的梦想来到了新加坡，有不少移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有一部分人省吃俭用源源不断地给家乡的亲人寄钱。那个时代在新加坡的移民至少逃离了国内的战祸和饥荒。

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也的确产生了一批白手起家优秀的华裔商人，他们在新加坡靠着自己的智慧、机遇和勤俭成为华人中的领袖。这些人都拥有自己的实业，与欧洲官员之间联系密切，他们在本群体和欧洲官员中都享有绝对的权威。新加坡的华人普遍对大英帝国的安定和在全世界的强大力量充满信心，他们向往新加坡的繁荣，以及普遍接受新加坡所创立的西式教育和工作中的职业化的倾向，并全力地接受这种挑战。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际之际，新加坡已经发展为了国际大都市。新加坡表现出英国化的繁荣、开明、先进、治理得井井有条。新加坡这个多种族的异质化社会“整洁有序，人们安居乐业，商业往来频繁，一片繁荣景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英国的法律和英国的保护。新加坡的三大支柱是自由贸易、公平征税和司法公正”。<sup>[1] (P155)</sup>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一次短暂的萧条后，锡、橡胶以及石油的需求，引领了新加坡经济又一次高涨。1927年华人移民数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高达36万人，许多人甚至在锡价高涨时一夜暴富。新加坡的马来人在英殖民者的保护下，一直保持着半田园化的生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移民也有一部分在新加坡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印尼和马来人中间没有任何团结一致的地方组织或领导者，印度教、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有各自的宗教圣地，他们并不抱团。印度尼西亚富人和马来移民中的富人在新加坡拥有大量的财产，在本地还有自己的胡椒和甘蜜种植园。

或是地狱。尽管新加坡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制造了一夜暴富的神话，但是，个人财富极端惊人的聚集在一小部分亚洲人手中。新加坡各族群大都处于自我管理状态，其中以华人成立的各帮会最为著名，华人各自以来源地成立帮会。大多数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移民在甘榜、爪哇、布吉街和阿拉伯街的城镇中定居下来，和平地融入新的环境中。马来西亚人群并没有组织像华人那样的帮会领袖。大多数华人移民来到新加坡之后都会投靠比较熟悉的团体，所以就滋生了最残酷和最邪恶的苦力贸易。被贩卖的人口通常称为“猪仔”，他们公然被骗、劫持、下药等运送到海外，从此就开始了悲苦的命运。运送“猪仔”的船只被称为“浮动的地狱”。船里拥挤臭秽难以形容，闷热缺水，疾病传播，并肩迭膝而坐。1875年6月，有一艘载着400人的船从厦门开出，因拥挤、不卫生，没有医生、医药，霍乱流行，到达新加坡时只有200多人还活着，近200具死尸被抛进海里。<sup>[2]</sup>“猪仔”被运到新加坡来，被打手严禁看管，稍有不从就是暴打，并且不给医治，生病的人得不到雇佣，很快就会死路一条，而身强力壮者被买走之后，必须为雇主服务一年，一年之后才有自寻出路的自由。

在新加坡各种族中富人的主要问题是暴饮暴食，而大部分民众，最大的问题是贫困、营养不良，疾病、居住过度拥挤和吸食鸦片。据林文庆博士领导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1896年向当局呈递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加坡的死亡率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徘徊于44%—51%之间，高于香港、锡兰和印度。”<sup>[1] (P155)</sup> 由此，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新加坡殖民时期的社会事实，对于富人来说这里是天堂，文明、法治能享受良好的生活秩序；而对于穷人来说，这里就是地狱，剥削、没有生命保障的折磨和疾病使得这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事。

## 2. 英殖民时期族群在职业和教育方面的隔离情况

殖民时期，新加坡各族群团体间都有很明显的经济、劳工分界线，各自居住在彼此独立的空间区域，职业和学校中。除了经济交往，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交往，每个族群之间都存在着适当的距离。<sup>[3] (P185)</sup> 新加坡的政府有意在其多样化的人口中设立“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新加坡，官吏、

驻军和商贾主要是英国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包括富商、内地农民和劳工。马来人通常是渔夫和船夫，并担任巡逻警察。

首先，新加坡规划中，富裕的商人是不需要按照区域规定混族居住的。并且在商业区，重要的亚洲和欧洲人的商铺、公司和货仓是紧挨着的。新加坡当局也鼓励欧洲人和亚洲人毗邻而居、毗邻经商。可以说，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赚多少钱比他的肤色更加重要。<sup>[1] (P31)</sup> 而大众层面，不同族群之间就更少有交集了，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成了不可逾越的隔阂。

在新加坡的另外一种族群分层就是基于教育的分层，进而带来的职业分层和贫富差异。因为英语能带来求职上的优势，所以当时新加坡政府建立的泰米尔语双语学校，最后都改成了英语中学。华人的教育是华人社群自行操办。富有的华商“既是纯粹的中国人，又是地道的英国人”<sup>[1] (P801)</sup> 在新加坡，英语也区分着本来就方言众多的华人社群，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几乎是被大地主、企业巨贾所包办，他们俨然以社会领袖自居；至于中层阶级，小商贩、小农园主、书记及小学教员占了绝大部分；而雇员、苦力劳工、小贩等，却充当了最下层的阶级，人数也比较多。”<sup>[4] (P4)</sup> 由于种族的居住隔离、语言隔离和教育隔离再加上各族群接受教育的人数和能力不同，造成新加坡不同种族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语言、宗教、习俗、社会组织方式 and 经济运营等方面都不同。

但是，马来青少年的教育一直没有改善，而大多数马来人，不管是在新加坡出生的还是移民的，一般从事不太体面的工作，像看守、车夫、园丁、仆人或警察之类的。英语教育使得新加坡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职业化上层阶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英语教育是进入上层社会的敲门砖。英语教育可以使出类拔萃者成为职业精英，也可以成为公务人员，而普通的英语受教育者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19世纪末，在新加坡的阿拉伯人大多很有学识和教养，他们的大家族通常都非常富有，在新加坡半岛有自己的茶园、胡椒和甘蜜种植园，还购买了新加坡大量的地产。20世纪初，受过教育同时会英语和马来语的马来人也得以在新加坡的商业社区占据一席之地，有人开店发家，有些人被雇佣为文员、

翻译和教师。

## 二、日本殖民时期：延续隔离 挑起情绪

在日本殖民时期，由于华人对日本的顽强抵抗，激起日本人对华人群体的整体仇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之后，支持马来人并利用告密政策，鼓励马来人告密华人和杀害华人，拉大了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隔阂和仇恨。因此，尽管日本殖民时期的时间不长，各族群之间依然是种族隔离，但是，各族群之间的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人激起了马来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和反华的情绪。

日本殖民和英殖民时期就大不一样，李光耀曾经这样形容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情形，没有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英国人称王称霸之后，对同是亚洲人显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一和凶狠的统治。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时间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人折磨、殴打或者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sup>[5] (P59)</sup>。日本统治新加坡的三年多时间里，新加坡民生凋敝、人口伤亡惨重。日本人实行恐怖统治，逼使人人彼此监视，家家相互告密，使人们对邻居都不敢信任。为了防范一个共同战线的形成，日本人煽动各社团之间的潜在猜忌，挑拨民族的相互敌对，对待中国人更是残酷无比。<sup>[6] (P155)</sup> 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期，对华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当时就是任用的马来人和印度警察。当时日本人在新加坡针对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实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日本人雇佣了数百个锡克教徒充当警察，他们比主人还凶，经常会殴打平民，马来人由于历史太短可塑性强，难以抗拒日本人统治，英国人跑了之后，多数马来人希望日本人接着保护他们。在新加坡能反抗日本的只有华人，由于中国战场遭受了顽强的抵抗和华侨对抗日的支持，早就激起日本人极大的仇恨，日本人制定过了针对华人的大检证、大肆屠杀，还对华人进行经济压榨，英属殖民地华人缴纳5000万元的奉纳金，日本殖民时期屠杀华人数十万，其残暴行径无法形容。之后，主控官科林·斯利曼对日本暴行做了心酸的评价：这些行径使人接触到人类最卑劣、最堕落的一面。<sup>[6] (P101)</sup> 与此同时日本人支持马来人和印度人，并在新加坡奉行马来民族优先的思想，同时煽动了马来人的反华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华人和马来人

之间的矛盾。

尽管英国殖民统治对新加坡不同族群采取了隔离政策，族群之间也存在隔离。但英国殖民统治一直对自己统治时期新加坡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稳定比较有信心的。早在1949年时，殖民政府发给联合国的信息中写道：本地不存在比较大的种族和文化关系方面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种族都和谐地工作和生活在一起。<sup>[9]</sup>在日本殖民时期情况就变得大有不同，日本统治者的残暴、无情以及对新加坡成为日本战争时期资源和金钱的供应地的定位，造成了新加坡各族群严酷的生存环境，残酷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彼此互害并不罕见，何况新加坡本身原有着族群之间偏见和歧视的存在，加上殖民时期日本人挑起的反华情绪，所以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气焰高涨也不奇怪。

### 三、新马联邦时期：种族冲突

阿伦特说：“在任何一刻我们生活过的世界就是过去的世纪”<sup>[8]</sup>（P14）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现在的轨迹都有过去的经历，比如历史上殖民者为了方便管理随意划分的族群身份，在反殖民运动时期成了寻求族群独立的理由，这不仅说明了历史的延续，也说明带有偏见和歧视而建构的族群性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新加坡也是如此，被英国统治精英临时构建的各族群身份，所带来持久的情感联系，最终变成了冲突。

#### （一）新马联邦时期种族冲突的原因

谢国斌说：“若从负面角度视之，区辩的指标愈多元时，也意味着其愈难与其他族群互动，愈难容忍其他族群的异质性，也愈容易出现族群冲突。”<sup>[9]</sup>（P17）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属于这种情况，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血缘、外貌、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区别指标多。新马联邦时期是马来人和华人种族冲突最为激励的时期，这种冲突甚至演化成为种族暴力，造成了人员伤亡。究其原因，最直接的矛盾是李光耀和以东姑为首的马来领袖之间存在着理念的冲突。但事实上引起种族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存在的偏见和歧视，正是这种偏见和歧视深深地存在于马来人和华人之间，造成马来西亚的领袖认为，马来人智商不高，竞争不过华人，马来人必须牢牢地霸占统治地位，才能获得心理安全。在新马联邦期间，东姑决定成立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因为他觉得马来人根本无法与华人和印度人平等竞争，这

种心理上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巫统掌握了马来西亚的统治权后，就转化为必须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这种政权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必须是马来人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不管这样做对其他种族是否公平，也要牢牢地把握权力。

李光耀和他的同僚根本不同意这种信仰，他们坚决维持多元种族主义纲领，不接受巫统占支配的做法，人民行动党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这与当时巫统的领导思想相违背。由此，导致东姑、陈修信以及赛加化阿峇都对李光耀发起了攻击。他们认为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内部缺乏民主，所以李光耀的民主观念很可疑，并觉得李光耀急功近利，想要获得马来西亚的大选，他们认为李光耀一直看不起马来人。如果按照李光耀的设定，新马合并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比例就会大致相当，可以把马来西亚建成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那么李光耀他们必然掌握马来西亚的统治权。

#### （二）新马联邦时期种族冲突的状况

随着《马来先锋报》不断地歪曲事实，挑起了马来群众的情绪，加上赛加化阿峇的煽风点火、鼓动使得马来人情绪高昂。1964年7月21日爆发了巫华暴乱，是由巫统领袖一手策划的闹剧，是巫统的极端分子挑起了第一次种族暴乱，巫统党员的民族主义居心已经昭然若揭。紧接着同年的9月2日，芽笼地区发生了巫华冲突，是第二次民族冲突。由于李光耀坚持了新加坡在马来联邦中的领导权，别有用心的马来领导人挑起了种族冲突，种族冲突的爆发促使李光耀下定决心，绝不会接受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分家已成定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东姑一直忌惮李光耀的才能和智慧，分家也是东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新加坡的独立可以称为“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光耀本身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陈修信过分在经济上剥夺新加坡的利益，以及赛加化阿峇不断挑起的种族冲突，使局势无法扭转，被迫无奈，走投无路之时，才成就了李光耀“立国者”的事实。

#### 四、建国伊始的困境与危机意识形成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种族间的交流非常有限，许多人选择住在自己种族的区域内，上本种族语言的学校，甚至独揽某些行业。<sup>[10]</sup>（P176）新加坡的

日子并不好过，经济危机加上邻国的虎视眈眈，导致了建国初期领导人一直小心翼翼的处理各种关系，唯恐稍有不慎，导致覆国。但这种危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生存危机，一种是担心国内处理不好引起邻国打击报复的危机意识。正是由于危机意识的存在使得新加坡政府练就了夹缝中生存的能力和驾驭各种关系的娴熟技能，从此，危机意识作为保证新加坡卓尔不凡最重要的思维模式而一直存在。

#### (一) 直面困境萌发和形成危机意识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一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就是没有淡水和自然资源。早在1962年，新加坡向联合国提交一份备忘录声称：“新加坡……在淡水供应、贸易和生存方面都依赖马来西亚。它要独立生存不太可能。”<sup>[11]</sup>这种生存危机，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就演变成为一种恐惧意识和对种族矛盾的担心。主要表现在，内部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的压制和制裁。比如新加坡资源缺乏，没有淡水，其淡水供应掌握在马来人手中。此外，新、马之间不单是邻国，已经相互之间影响和渗透，独立之后他们的敌意不会轻易消除。独立之后1966年2月，新加坡工艺学院附近发生暴乱；翌年11月，马来半岛的一个市镇北海和对岸的檳城发生华巫冲突。<sup>[12] (P58-59)</sup>而当时，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也曾陷入僵局，在新加坡尝试和马来西亚合并的三年内，正是马印三年对抗时期，因此合并直接导致了新、印的对立，并损耗双方之间的贸易。新加坡独立之后，印度尼西亚曾派两名水兵在新加坡策划了一场炸弹奇迹，新加坡执意处死了两名水兵，引起了雅加达反新加坡的暴乱，这件事一直阻碍了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交往，此外，新加坡在独立之初一心想形成独特的国家认同，这在当时乱象丛生的东南亚无疑是独树一帜，其治国理念最初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不愉快。

#### 二、危机意识形成的意义

由于新加坡领导人的重视，种族危机并没有实际的事情发生，但危机意识后来发展成为新加坡国家成功的最重要的思维模式，并形成了新加坡在发展的道路上居安思危的发展思路。新加坡坚持用危机意识不断地来提醒人民要安居乐业、遵纪守法、勤俭持家，并用这种危机意识时时提醒新加坡政党和政府严格要求自身。

#### (一) 危机意识下新加坡的合理定位

新加坡独立时期，国际环境也正处在冷战状态下。所以，新加坡处理不好国内的族群关系，不仅会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会影响到新加坡是否能获得英、美、日等国的支持。清楚地知道了困境，新加坡对自己的合理定位是生活在穆斯林海洋中的小岛，要想生存就必须看邻国的脸色行事。时任外交部长的拉贾拉南就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指最重要的是和大马之关系……这必然是一种特别的外交政策，也必然是一种基于了解大马生存和幸福及建立在新加坡生存之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反之依然，新加坡之生存和幸福也是大马生存之基础。”<sup>[13]</sup>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共同签署《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除了和东南亚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外，新加坡还积极地向外发展引进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外资和企业来新加坡发展，用大国的势力来均衡新加坡的外交威胁。李显龙总理说：“新加坡的成长动力是危机意识——‘因为国小，若不出类拔萃就会遭遇危险’的不安意识。要弥补我们所处的环境弱点，我们（政府与国家）一定要保持卓尔不凡。”<sup>[14] (P49)</sup>新加坡身处在危机重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以及新加坡的自然资源的缺乏和害怕马来人报复的恐惧，都构成影响了新加坡对自己的定位。新加坡这种定位，为新加坡赢得了建国初期和国际动荡时期的良好发展机会。新加坡能够全面吸引外资，并很快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就得益于危机意识下对自身的定位。

#### (二) 危机意识下新加坡开放和多元经济模式的形成

正是这样的危机意识使得新加坡没有成为一个依赖转口贸易的经济港而实现了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新加坡当时面临的情况非常糟糕，根本来不及浪费时间去责难谁和在冷战中掺合。新加坡领导人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让人民有饭吃，有工作，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充分利用手头的资源和积极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发展经济。这样到了1969年新加坡已经变成了黄金市场，到60年代这十年的结束，新加坡几乎实现了全部就业的状态，有些部门还发生了人力供不应求的。<sup>[1] (P419-423)</sup>

在内忧外患之时，新加坡不断地修复和别国

的关系，也积极地寻求大国的友谊。在英国从新加坡撤军这段时间内，李光耀积极访问美国，后来美国、日本、英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国。正是因为新加坡领导人有着生存危机意识，所以新加坡被迫最早在“全球经济”一词还远未出现在字典里的时候就开放经济，成为向世界完全开放的全球经济体。<sup>[15] (P7)</sup>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新加坡被迫与跨越周边的西方世界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不得不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展开实力的竞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得以生存、发展、繁荣。也正是这样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新加坡坚持多元种族政策，不但平衡了国内各种族之间的关系，还保持国内的稳定和发展。

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总是会照耀未来，也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如果新加坡没有经历马来联邦时期的种族冲突和危机，没有亲身经历民主主义情绪被鼓动和挑起那种癫狂，没有感受到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带来的危害，新加坡就不会把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不论何种种族和宗教，都要和平相处这样的政策作为国家稳定的基石。其次，冲突背景下的独立，使得新加坡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原因。李光耀一直坚持：“如果种族团结的基础破坏了，新加坡将不会有第二次机会。”<sup>[16] (P114)</sup> 新加坡之所以重视宗教和族群问题，原因主要是害怕和恐惧独立后的新加坡不能生存下去，所以新加坡领导坚持不懈，一直努力平衡各种关系，坚持远见和创新走符合新加坡国情的道路。因为危机意识，也因为危机下催生的智慧和敢于应对危机，才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卓尔不凡，精益求精。

阳敏，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

[2] H. Norman, *The People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1895.

[3]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Singapore: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 Limited, 1984pp157-161.

[4] Tregonning, K.G., *A History of modern Malaya*,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4.P185.

[5] (新) 郑良树. 马来西亚 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文, (卷一) [C]. 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1982.

[6]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N]. 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 1998.

[7] (英) 哈·弗·皮尔逊 . 新加坡通俗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8] *Colony of Singapore in formation on singapore for 1949 trans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ingapore, 1949).

[9] (美) 汉娜·阿伦特. 反抗“平庸的恶” [M]. 陈联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0] 谢国斌. 族群关系与多元文化政治[M]. 台北：台湾国际研究会, 2013, P17.

[11] *State of Singapore, Comenment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n the Memorandum by Nineteen Singapore Opposition Assemblymen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Colonialism.*

[12] 孙景峰.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13] 郭继光. 李光耀的地区合作观[J]. 东南亚研究, 2000, (1), P39-43.

[14] (新) 吴元华. 新加坡良治之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5] 严崇涛. 新加坡成功的奥秘：意味首席公务员的沉思[M]. 张志斌,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所作序言, P7.

[16]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李光耀执政方略[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参考文献：

[1] (英)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斯. 新加坡史[M]. 欧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何 必)